

泉州市李贽思想学术研讨会



论
文
集

泉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
泉州市李贽学术研究会

泉州市李贽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泉州学林 2004·增刊II)

泉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
泉州市李贽学术研究会
2004年12月

泉州市李贽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委会

主 任: 黄少萍

副 主 任: 熊志强 朱学群

委 员: 吴幼雄 王来斌 陈少牧

曾焕鹏 彭丽花 王瑞钦

李培德 朱林果 庄仁哲

丁毓玲

主 编: 朱学群

副 主 编: 王瑞钦

本期特约顾问: 陈祥耀

本期特约编委: 张建业 许在全 庄锡福

李少园 黄海德

本期执行编辑: 陈彩珠 张明 郑梅聪

目 录

李贽和历史人物评价	苏双碧 (1)
李贽和 21 世纪	郭预衡 (10)
李贽:中国市民萌动之初的思想先驱	蔡灿津 (12)
李贽的思想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	胡沧泽 (27)
李贽思想先进性浅议(初稿)	何乃川 (34)
晚明思想家李卓吾思想深蕴之现代价值 “狂怪”和“与世无争”	金惠经 (44)
——论李贽的双重文化人格	许建平 (51)
落发者的入世精神	
——论李贽“异端”的彻底性	李建民 (77)
李贽诗指要五题	张建业 (83)
李贽非理性主义文学思想论	
——以万历十九年夏至二十四年夏为论述中心	许建平 (96)
李贽与晚明短篇白话小说中的女性文化	曹亦冰 (111)
李贽《童心说》的写作年代考	林海权 (125)
李贽“童心说”之辨析	宋新军 (134)
浅谈李贽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廖渊泉 (140)
李贽《老子解》、《庄了解》写作时间考	陈来胜 许建平 (145)

- 无念与李贽 凌礼潮(161)
- 李贽与袁宏道佛学思想的对比研究 张岱(171)
- 李贽在鄂东的讲学和著述活动 白战存(192)
- 《百子金丹》辑录之评点与李贽思想综合研究 李国宏(217)
- 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与李贽经济思想的比较分析
——兼谈“经济与人生理想”辨析
黄凯南 陈雷 黄凯伟(228)
- 略论李贽的平等观 张吉昌(245)
- 试析李贽的是非观 沈玉水(251)
- 试论李贽的孝悌观
——兼论李贽的传统意识与异端思想的关系
李金表 李静蓉(260)
- 从《迭氏墓圻志》再论李贽是回族人 吴幼雄(271)
- 李贽故居再考 李少园(277)
- 李贽世家考 李马星(284)
- 与泉州古城内涵同构的泉州古人——李贽 陈凯峰(287)
- 李贽与蔡清 许在全(298)
- 黄寿祺《续焚书校勘》述评 黄高宪(307)
- 百年李贽研究回顾 李超(327)

李贽和历史人物评价

苏双碧

李贽评价历史人物，有他自己的标准，有他自己的思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是儒家思想的叛逆者，是宋明理学的激烈批判者。自汉代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历代思想家、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多以儒家思想为准绳。李贽作为一个“叛逆”者，在对待历史人物评价时，就必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与传统历史观唱反调。他客居黄安时，在给焦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披阅，……尝谓载籍所称，不但可赫然纪述于后世者是大圣人；纵遗自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羨。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摘；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辩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1]（《续焚书》卷1）他认为过去评价历史人物，造成不少冤屈，而他对历史人物评价时是想替这些受冤屈的历史人物“辩雪”，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历史的传统观念，往往从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表现出来。李贽读史时和“百千万人作敌对”，正是想对历史人物一一审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刺痛了封建传统势力，击中了反动理学的要害。封建专制主义者在逮捕他入狱时，把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当成主要罪状，说他“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

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2]（《张问达劾李贽疏》从这里所举被李贽重评的历史人物看，主要有两个基本点，即如李斯、吕不韦、秦始皇等是属于垂功于历史的人物，应予肯定；而肯定卓文君善择佳偶，则旨在反对假道学对妇女的歧视，提倡婚姻自主，具有进步意义；至于孔子之是非不足据，则是他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例。在封建道学家们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当然不能允许。不过，也正因为专制政权对李贽的因评价历史人物而进行迫害，才更显出李贽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独到之处，以及他的胆略，下面想举几个例子。

其一，非孔的矛头主要指向假道学。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大圣、先师，他的学说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人人都必须以孔子的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几乎是两千多年来知识界共同信守的原则。对此，李贽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有自己的观点，即自己的是非观。他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说：“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3]也就是说，各人有各人的是非观，如果各有的是非观被别人所接受，不也可以吗？他指出，千百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3]历史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前进的，任何人的观念都是受到历史和时代局限，孔子也不能例外，怎么能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呢。

李贽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传统势力，使封建意识形态失衡，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是非的标准。可知李贽所反对的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惰性，并不是刻意反对孔子个人。例如，理学家倡言“存天理灭人欲”，说什么“修身”时要有大公无私之仁。能做到这些的自然是那些被认为能

点化人间的“圣人”，即那些讲空话的理学家。李贽针锋相对，指出人都是有私欲的，都有趋利避害之心。他在《藏书·德业儒臣后论》中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心于鲁也决矣。”^[4]这是一般道理，连孔子也无法否认。理学家鼓吹“灭人欲，”并不是孔子的本意，而是拿着孔子做招牌，进行骗人的勾当。李贽抨击的仍然是理学家的假道学。

李贽对假道学打着孔子的旗号，招摇惑众，十分反感。理学家们鼓吹孔孟之道“天下遵之则治，违之则乱”。^[5]对此，李贽在《答耿中丞》进行了有力地反驳，他指出，人“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1]（《焚书》卷1）在《答耿司寇》中，李贽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但却硬说是什么“我为他人”，并以此标榜他们的行为是孔孟之意。李贽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1]使那些自诩为秉承孔孟教训之徒的两面派丑行暴露无遗。李贽指责那些自称孔孟高徒，实际上竟连被他们瞧不起的“市井山夫”都不如。至少那些市井山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并不弄虚作假。

其二，肯定武则天，意在于宣扬男女平等。李贽针对儒家“男尊女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说教，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赞扬卓文君善择佳偶，赞扬武则天当政时的政绩，批驳了封建儒家对卓文君、武则天的非议。武则天当皇帝之所以受到儒家道统的非难，主要原因是武则天是个女人。他们为了丑化武则天，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她的私生活受指责更多。在封建社会，男人当皇帝，可以有成百后妃，女人当皇帝有点私生活为什

么就是丑行。对此，李贽认为武氏的所谓丑行，也不过是那些“拘守圣人名教”的贤人制造出来的。其实，这些人的丑行并不比武氏好多少。但这些人为了贬斥武则天，闭口不谈武则天的政绩。而李贽对武则天的政绩却给予很高的评价：“诚观近古之王者，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专以爱人才归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于万世之公鉴矣。”^[4]（《藏书》卷48）这些评价是公允的，但和封建道统比较却是相悖的，其实，李贽对武则天的肯定，除了和传统历史作敌对之外，更重要的是和他主张男女平等相关联的。李贽对历史上的一些女杰，如无忌母、班婕妤、从巢者、孙翊妻、李侃妇、海曲吕母等等，都称之为“真男子”。他又愤然指出：“然天下多少男子，又谁是真男子者？”^[6]（《初谭集》卷2）所以，“男尊女卑”是圣人、名教造成的，是没有根据的。

李贽既肯定女权，对卓文君自择佳偶，他自然大加赞赏，他说：“相如、卓氏之梁鸿也。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之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夫！斗筭小人，何足计事，徒失嘉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4]（《藏书》卷37）李贽对武则天、卓文君等的评价，说明李贽不但尊重女权，主张男女平等，而且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女子在社会上处于受支配地位。这一点是封建道统、儒家之徒所不能做到的。这也说明李贽思想在当时是高出时人，具有一定进步性的。

同时，李贽认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指出尧舜和平常人一样，圣人和凡人一样，都是平等的。这样就把封建社会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一概否定。王侯将相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是人，富有和贫苦人所享受的权利一样，这才是“真平等”。特别是受教育方面，男子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也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李贽针对道学家们所谓“女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说教，”指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

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焚书》卷2《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李贽揭露了道学家歧视妇女的错误，指出女子和男子有同样的见识和能力，在招收门生时不论男女，以实际行动回击了道学家们的谬论。这些思想都可看出，李贽思想资料中有许多新的因素。他赞扬促进历史进步的人物，称颂有功于历史的伟人，主张男女平等，给有益于历史的女杰以高度的评价。从李贽的历史观看，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他主张历史总是向前演变的，他反对因循守旧的历史观，这是李贽历史观的总脉络和总趋势。

其三，颂扬历史上的革新人物，目的在抨击当时因循守旧的腐败政府。李贽对商鞅、韩非、申不害的变法，认为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1]（《焚书》卷《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给予肯定的评价。对秦始皇，李贽十分推崇，称之为“豪杰”，赞颂“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7]（《史纲评要》卷4）。对因循守旧，左顾右盼的儒家则批评他们“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1]（《焚书》卷1《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因此对儒家的显要人物孟子、董仲舒、朱熹都大加贬议。指出，这帮人“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顾，践迹而不能造其域。”^[3]（《藏书》卷17）。对张居正则称之为英杰宰相。李贽很推崇何心隐，因为此人除了学术上的“异端”，即批判封建理学之外，许多见解反映了市民思想。明政府，以及明代士人，大多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大多贬斥革新，何心隐之被害，便是一例，李贽却大声疾呼，为其鸣不平。

其四，肯定林道乾、宋江，目的在抨击冠履倒施专制而腐败的王朝。万历年间，曾在闽、粤海上活动的林道乾，当局称之为盗贼，欲痛剿之，李贽却认为林道乾之所以在海上横行是因为“举

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威，直驱之使为盗也。”他在历述当朝对林道乾的征剿之后说，连倭寇也被平息了，“然林道乾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1]（《焚书》卷4）。又在《因记往事》一文中称林道乾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林道乾当时活跃于福建、台湾、广东沿海，其成员主要是不堪地主压迫的农民，从事海上活动后主要是经商。据《神宗实录》所记，林道乾“盘据山谷，聚众数千，据膏腴之田，以自安固，至今无可奈何。”既据山谷，又据膏腴之田，是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能“横行”三十多年。李贽这样称颂林道乾，是具有勇气和叛逆精神的，这种思想和当时的假道学家完全是对立的。

李贽对《水浒传》也有过许多评议。在《忠义水浒传序》这篇文章中认为，“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未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又说：“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1]（《焚书》卷3）李贽对水浒的评价很有见解，他歌颂水浒皆忠义之士，但他尖锐地指出，宋江等人皆“专图报国”，“心在朝廷”。李贽是个爱国主义者，他见明王朝吏治腐败，江河日下，自然痛心疾首。因此，对宋江等的“身在水浒，心在朝廷”的人是很推崇的。农民战争归根到底无非是想换个好皇帝，过上太平的日子。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在发动起义之际，有推翻腐败封建王朝的雄心壮志，却没有可能设想建立一个有别于封建王朝的国家。因此，李贽认为宋江这些人虽然起来造反，却是为了朝廷，为了国家。这种见解，虽然有受时代局限的一面，未能指出宋江所忠义的政权，是不足以把中国的社会改造好的。但李贽指出农民起义是“身在水浒，心在朝廷”却是历史的事实。

不过，上面所说的宋江心在朝廷，这里的朝廷是象征性的名词，是不能和当时的明王朝划等号的，因为当时的朝廷处于“冠履倒施”的不正常现象。正如李贽指出的：“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1]（《焚书》卷3）《忠义水浒传序》真是一针见血，他认为，“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是对的，而“以小贤役人，大贤役于人”是不合理的，人心是不能悦服的。明王朝的统治者尽是一些无能之辈、不肖之徒，而林道乾、宋江这类有大贤、大德的人却被当成叛逆加以诛剿。如果让这些有德、有才的人到朝廷任职，自然要比朝中那些不肖之徒强出许多。可知，李贽的“朝廷”是要有个开明的朝廷，大贤大德的朝廷，并不是腐败无能的朝廷。

李贽由于受时代局限，不可能给农民战争指出一条出路，而且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只能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完善到衰败，而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所谓农民政权，来取代封建政权。从这一点来说，李贽赞扬“身在水浒，心在朝廷”的宋江也就可以理解了。而李贽当时虽然看到封建道统对社会的束缚，从而产生了对孔子儒学的抨击，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鞭挞，但他同样找不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事实上，他仍然希望有个修明的社会，而这个修明的社会首先是要有个好的皇帝，从宋江的“忠义”吸取历史的教训。所以，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指出：“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1]（《焚书》卷3）。这段话很深刻，如果当

道者能以水浒为借鉴,去掉水浒所反对的那些弊政,重用宋江、林道乾这类有才能的人,改变“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局面,国家就能搞好。这是李贽评水浒真义之所在,也是李贽叛逆精神和历史局限性互相交织的表现。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李贽推崇宋江、林道乾,其对立面都是专制而腐败的王朝,都是那些不肖之徒当政,逼得那大贤、大德之人,落草为“寇”。这正是当时明王朝的写照。

上面四点,我们可以看到李贽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是抱着和传统历史观相敌对的,是从颠倒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人物的。正如他在《读书乐引》中所说的:“无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析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1]《焚书》卷6)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人物,李贽认为对历史上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都要推翻,对被枉评的历史人物,应为他们“辨雪”,即重新评价。

李贽不论是非孔,还是颂扬秦始皇、武则天、尊宋江、林道乾为大贤,都是针对着假道学的。假道学家们,是以他们自己定下的标准,即贵人和贱人、贤人与不肖、君子与小人,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因此,这些人定的标准是维护封建政权,维护封建道德标准的而不是客观标准。假道学宣扬“天生圣人”,他们的言论、意志就都是正确的,都是真理。对此,李贽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指出“致之一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9](《明灯道古录》在李贽看来,天子和庶人都是平等的,不应有贵贱之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看他是否作出贡献,看他品德和为人,而不是看他那些伪善的表白和宣言。这些就是李贽评价历史人物上和假道学的根本分歧。

(作者系《求是》杂志原副总编)

(责任编辑:张建业 校对:张明)

参考文献:

- [1]张建业.李贽文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2]神宗实录;卷369.
- [3]张建业.李贽文集;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4]张建业.李贽文集;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5]耿天台先生全书;第1卷.武昌:武昌正信印务馆.
- [6]张建业.李贽文集;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7]张建业.李贽文集;第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8]万历实录;卷3.
- [9]张建业.李贽文集;第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李贽和 21 世纪

郭预衡

历史进入世纪之交以来，时常看到“面向 21 世纪□□□”或“□□□□与 21 世纪”这类的标题。偶读报刊，又看到在“面向 21 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有“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的建议。^[1] (P21) 我于是想到“李贽和 21 世纪”这个摩登的话题。

李贽曾经“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而得罪。他大概是瞧不起“孔子的智慧”的。他也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四百年后的 21 世纪，“人类要生存下去”，还必须“汲取孔子的智慧”，不仅要依据“孔子之是非”而已。

但李贽“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也曾讲过自己的一套“公理”或“婆理”，在《童心说》里有如下几句：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

^[2]（《焚书》卷 3）

在李贽看来,圣人孔子的一些言语,都是“迂阔门徒、懵懂弟子”,“随其所见,并非都是“万世之至论”。既然如此,则“孔子之是非”,也就“不足据”了。

这样说来,李贽又似乎是“公说公有理”的。

但问题在于:李贽说孔门诸贤是“迂阔门徒”和“懵懂弟子”,说《论语》诸书“有头无尾,得后遗症”,话也说得过于放诞,既背叛了圣人,又轻蔑了贤人。新世纪的时贤,讲到《论语》就不这样看。例如南怀瑾氏的《论语别裁》,附录《孔子新语发凡》,其中就有这样的话:

二十篇《论语》,都已经孔门弟子的悉心编排,都是首尾一贯,条理井然,是一篇完整的文章。^[3]

南氏这话,恰与李贽针锋相对。李贽说“有头无尾”,南氏说“首尾一贯”;李贽说“得后遗症”,南氏说“条理井然”。同一部书,何以有如此不同的观感?

遗憾的是,李贽之生也早,其死亦早。《论语别裁》一书,他不曾看到。如果他能活到21世纪,能看到有此“别裁”的《论语》,则他不仅对孔门《论语》诸书将有所改观,对于“孔子的智慧”,也将比那诺贝尔奖获得的西儒更有先见之明的预言。

还有,李贽撰《童心说》,曾是探讨“天下之至文”的,如果他能活到21世纪,得到《论语别裁》的启示,也将称《论语》为“天下之至文”,何止“一篇完整的文章”而已!

这篇《李贽和21世纪》,也就写到这里。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建业 校对:张明)

参考文献:

- [1] 寻根. 郑州:2003年6期.
- [2] 张建业. 李贽文集:第1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3] 南怀瑾. 论语别裁.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李贽：中国市民萌动之初的思想先驱

蔡灿津

李贽（1527—1602）是我国十六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他和他的名著《藏书》《焚书》《续藏书》《继焚书》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高度赞扬。但李氏作为思想家的历史定位，却尚有待深入探讨。人们充分肯定他的反封建战斗精神；倾向于肯定其仍为地主阶级思想家之列。其实，李贽的思想，就其实在含义而言，已经超出地主阶级所可能容纳的界限。李贽是当时新兴的近代经济关系萌动之初的思想先驱，是新生的中国市民力量萌动要求的代言人。

在李贽反封建反道学的言辞内里，所包容着最有价值的见解，是一种新的市民观念的初步表述。

李贽的时代

大凡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观念从根本上看来，也是由历史决定、适应历史的需要而造就的。李贽的思想，同样根植于当时的时代。十六世纪中国的社会是怎样的呢？封建制度依然在发展着，但已进入中晚期。一种新兴的近代经济力量破土而出、且较普遍地萌发了起来。这是当时最具实质意义的特点。

明时的社会经济在各种矛盾中逐步有了较多的发展。1405年，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船六十二艘，士卒二万七千多。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装载各色货物不计其数。如此规模，当时